

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集团化研究： 基于小多边主义理论视角

赵 祺 罗圣荣

[摘 要] 拜登政府上台后,大力推动“印太战略”小多边机制落地,加强对华围堵。本文基于小多边主义理论视角,发现拜登政府利用“印太战略”在基础设施、供应链和技术领域打造排他性的小多边倡议,在军事协调、军事技术转让和军事情报共享层面创设竞争性的小多边机制,在价值观层面构建功能性的全球民主国家联盟,意图整合“印太”盟友和伙伴,编织以美国为中心的对华遏制“集团”网络。机制化是集团化的手段,集团化是机制化的目的。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集团化既有扩大“印太”地区“朋友圈”的战略考量,也有掌握引领关键领域标准和规则的制度诉求,更有围堵和遏制中国崛起的权力诉求。尽管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集团化面临着美国与“印太”盟友和伙伴政策诉求差异、战略平衡困境和成本支付能力不足等因素掣肘,但其在一定程度上将弱化中国经济影响力,增加中国安全风险,损害中国国家形象。

[关键词] 拜登政府;“印太战略”;集团政治;小多边主义;中美关系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654/j.cnki.naf.2023.02.005

[文章编号] 1003-7411(2023)02-0065-(15)

[收稿日期] 2022-09-22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 & ZD146);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1BZZ081)

[作者简介] 赵祺,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罗圣荣,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昆明 650000)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从美国2022年2月11日发布的《美国印太战略》报告来看,拜登政府在“印太战略”方面既有继承,也有发展。其中最为明显的是,相较于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单边主义,^[1]拜登政府更加重视小多边外交,企图通过增强与伙伴和盟友之间的政策协同,构建“有力的且相互强化的联盟网络”(a latticework of strong and mutually reinforcing coalitions),进而形成针对中国的“集体实力”(collective capacity)。^[2]就当前“印太战略”的推进和实施而言,拜登政府更注重参

与或创设一系列小多边机制,如推动美日印澳四边安全机制(QUAD)和美英澳加新组成的五眼联盟(FVFFY)升级扩员,创设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印太经济框架”(IPEF)等,以整合“印太”盟友和伙伴,编织以美国为中心的对华遏制“集团”网络,进而依托“集团政治”加大对中国崛起的战略围堵和遏制。^[3]那么,拜登政府“印太战略”集团化的具体表现是什么?驱动因素有哪些?拜登政府“印太战略”集团化将对中国造成怎样的影响?探讨这些问题,不仅在学理层面有助于理解小多边主义的基本特征和内在驱动,而且在现实层面有利于中国化解美国打造的遏华集团网络。

既有关于美国“印太战略”的相关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三种视角。

一是地缘政治视角。穆罕默德·赛义德(Muhammad Saeed)认为,美国已经意识到来自中国日益增长的地缘政治挑战,并决心通过重启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机制,来维护全球霸权。^[4]大卫·斯科特(David Scott)明确指出,美国“印太战略”旨在拉拢印度,进而在地缘政治层面平衡中国崛起。^[5]刘雪莲强调,“印太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标志着美国地缘战略观念的变化和战略重点的转移,这些变化必然给中国带来新的地缘环境压力。^[6]葛腾飞指出,“印太”地区作为国际政治中一个较新的地缘政治塑造物,内含激烈的对华战略竞争乃至对抗意味。^[7]曾向红进一步指出,从“亚太”到“印太”的战略转变反映了美国对华战略从“L形布防”到“半嘴形包围”的转变,以及通过寻找战略支点以重构关键地缘政治空间的战略诉求。^[8]陈宇则强调,美国“印太战略”试图通过重构亚太地区的盟友及伙伴关系,形成从欧亚大陆东南包围欧亚大陆的“C型战略弧”,制衡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国家的崛起,以及边缘地带国家和枢纽地带国家的联合,继续维护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均势。^[9]

二是地缘经济视角。李明江认为,美国“印太战略”旨在对冲“一带一路”倡议,以维护美国的霸权利益和削弱中国在“印太”地区不断上升的经济影响力。^[10]威廉·钟(William Choong)指出,拜登政府上台后,美日印澳四方在疫苗交付、气候变化和关键新兴技术领域的合作,使四边安全对话机制获得经济合作动力。^[11]唐新华、孙海泳指出美国与欧洲盟国在数字、地外、生态以及发展空间等战略领域,正构建一个产业链“去中国化”联盟体系,并借此不断强化对华科技施压,进而降低对中国产业链依赖。^[12]毛维准主要聚焦于基础设施,强调美西方国家近年来推出多项全球基建方案,其意图主要是抢占全球基建的主导权和替代“一带一路”倡议的基建计划。^[13]陈靓指出美国“印太经济框架”旨在构建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重塑全球价值链,进而实现全球贸易的“去中国化”。^[14]

三是意识形态视角。莱汉·罗诺迪普罗(Raihan Ronodipuro)、邢瑞利等认为,拜登政府上台后,将价值观重新植入了美国“印太战略”之中,并置于优先地位。^[15]叶成城进一步指出,拜登政府以价值观为基础,构建小团体式“伪多边主义”;以价值观为纽带,打造多元化和立体化的联盟体系;以价值观为手段,对竞争对手进行打压和污名化;以价值观为动员策略,形成国内合作共识。^[16]王鹏权则强调,拜登政府“印太战略”意识形态化的深层动因是制造中国与“印太”地区其他国家的对立,维护美国霸权地位。^[17]此外,赵明昊和刘国柱指出美国试图通过制度升级、制度创建与制度回归三种方式,重构其主导下的“印太”地区制度体系以“规锁”中国。^[18]

综上所述,地缘政治视角、地缘经济视角以及意识形态视角在一定程度上为分析拜登政

府“印太战略”的集团化提供了借鉴和启示,但从单一维度论述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集团化,并不能全面掌握拜登政府对华遏制的全貌。因为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集团化涉及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诸多层面,需要以更加系统性的方式加以深刻剖析。另外,尽管部分学者综合经济、安全以及意识形态视角考察了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升级,却相对缺乏理论视角。本文基于小多边主义理论视角,对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集团化进行了研究,以期更准确地把握拜登政府“印太战略”集团化的具体表现、驱动因素和对中国的影响。之所以从小多边主义理论视角出发,原因在于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集团化主要是按照“小多边主义”的思路,通过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领域精心设计诸多小多边机制,整合“印太”盟友和伙伴,进而编织几乎覆盖整个“印太”地区的“集团”网络。

二、小多边主义与对外战略集团化

(一)小多边主义的基本内涵

小多边主义概念由来已久。冷战结束后,迈尔斯·卡勒(Miles Kahler)就行为体数目与集体行动有效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小多边合作形式比扩大化的多边合作形式更有利于克服集体行动障碍,从而有效地促进问题解决。^[19]维克多·查(Victor Cha)进一步指出小多边主义合作具有三个特征:1.参与者数量较少;2.合作方式较为灵活,没有正式的组织结构;3.通常关注传统安全问题。^[20]莫伊塞斯·纳伊姆(Moises Naim)认为,小多边主义旨在将尽可能少的国家拉到谈判桌前,以便对某个特定问题产生尽可能大的影响,进而提高国家间谈判效率。^[21]张勇则强调,小多边主义是有特定共同利益的三个或者三个以上的国家,本着追求集体行动效率的实用主义原则,通过非正式组织的安排,就特定议题寻求协调政策、构建共识与解决问题的制度实践。^[22]威廉·托(William Tow)进一步指出,小多边主义是一种成员数量较少(通常是三或四个)的非正式倡议,旨在解决特定的威胁、意外事件或安全问题,并共享解决该问题带来的收益。^[23]苏长和的观点与上述有所不同,他认为小多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关键区别不在于成员国数量多寡,而在于成员国合作性质。^[24]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小多边主义通常是三个或者三个以上的国家针对某些具体问题或挑战,以加强国家间政策协同、提升集体行动效率、维护狭隘小集团利益为目的的倡议或机制实践。

(二)小多边机制的主要特征

从性质来看,与多边机制相比,小多边机制主要具有便捷的行为可操作性、较强的议程设置有效性和鲜明的目标针对性三个特点。

第一,小多边机制具有便捷的行为可操作性。多边主义强调国家间的政策协调要依据共同的理念、规范和规则。^[25]因此多边机制的构建通常是一个不断演进的包容性政治过程,其大致经历凝聚共识、形成规范、创设机制三个主要发展阶段。^[26]而小多边主义是在国家对具体问题认识基本一致、需求基本相同以及价值观相近的基础上,形成某些被各国所接受并遵守的行为规范,^[27]从而逐渐整合原来松散的国家,形成固定的非正式组织。因此小多边机制一般没有明确的组织机构或决策程序,具有较为便捷的行为可操作性。

第二,小多边机制具有较强的议程设置有效性。就多边主义而言,随着多边机制集团成员数量的不断增加,成员间的利益愈发难以协调,多边机制的议程设置和解决效率问题愈发突出,最终导致多边机制的有效性不断降低。^[28]而小多边机制由于集团成员数量少,成员间的利益交集相对较少,更容易加强政策协调,更容易有效地就某些具体问题设置合适议程、达成共识。^[29]对于那些发现双边联盟或多边机制不能充分服务于自身利益的国家,小多边机制可以提供一种额外的中间立场。

第三,小多边机制具有鲜明的目标针对性。因为多边机制遵循不可分割性和普遍的组织原则,所以具有较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而小多边主义主要关注“临界群体”,^[30]这意味着小多边机制将对解决某一特定问题产生最大影响所需的尽可能少的国家带到谈判桌前。换言之,小多边主义认为只有将少数几个国家纳入决策之中,排除其他利益相斥和冲突的国家,才有可能针对性地解决某个特定问题,进而针对性地遏制该国家。

(三)小多边机制与国家对外战略集团化的联系

对外战略集团化是指国家根据战略竞争的需要,通过在各领域加入或创设诸多小多边机制的方式,把盟友和伙伴整合起来,集分散而“团”之,使其发挥“团”的优势的战略模式构建过程。^[31]在这个过程中,机制化是集团化的手段,集团化是机制化的目的。这主要是因为小多边机制能加强国家间政策协同,提升集体行动效率和维护狭隘的集团利益(见图1)。

第一,小多边机制能加强国家间政策协同。相比正式的、具有拘束力的和成员数量众多的多边合作机制进行漫长的政策谈判而言,在小多边机制框架内,国家可以迅速地与那些有共同价值观、共同利益和综合实力较强的国家组成灵活的联盟。譬如,“供应链弹性倡议”(Supply Chain Resilience Initiative)的构建进程就十分迅速,从日方提出想法,到日印非正式会谈,再到日印澳三国经贸部长宣布启动“供应链弹性倡议”,仅仅用时7个月左右。^[32]

第二,小多边机制能提升集体行动效率。曼瑟尔·奥尔森曾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提出,集团成员越多,提供最佳公共物品的可能就越小。奥尔森给出三个原因:1.集团成员越多,每个成员获得总收益的份额就越小;2.集团成员越多,公共物品的消耗就越快;3.集团成员越多,协调成本就越高,最终很可能导致产出公共产品的难度就越大。^[33]而小多边机制可以通过减少机制成员数量来克服集体行动困境,提升集体行动效率。^[34]

第三,小多边机制能维护狭隘的集团利益。多边主义旨在通过多边合作来形成共同规范,进而应对共同挑战。而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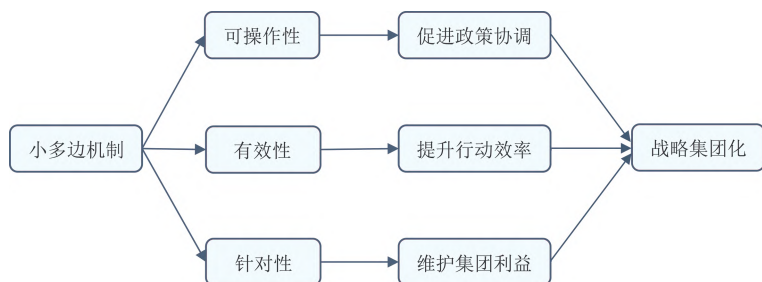


图1 小多边机制与国家对外战略集团化的逻辑关系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多边主义肆意抛弃多边主义平等包容规范,以国家利益为合作纽带,是一种以多边主义之名行单边主义之实的“伪多边主义”,谋求的是狭隘的集团利益。这主要是因为小多边主义是以国家权力优势为基础,很难摆脱权力政治的影响。这种

排他式、精英主义式的小多边“俱乐部”,通常会沦为霸权国维护其狭隘小集团利益、抢占势力范围的工具。^[35]

三、小多边主义视角下拜登政府“印太战略”集团化的具体表现

机制化是集团化的手段,集团化是机制化的目的。从小多边主义视角来看,创设小多边机制是拜登政府“印太战略”实现集团化的重要路径。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通过“印太战略”积极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领域参与或创设一系列小多边机制,意图整合“印太”盟友和伙伴,进而构建以美国为中心的遏华“集团”网络。

(一)以经济竞争为导向,参与或打造排他性的经济联盟

为弱化和抵消中国在“印太”地区的经济比较优势,拜登政府“印太战略”以“印太经济框架”为经济支柱,在基础设施、供应链和技术领域参与或创设了一系列小多边机制(见表1)。

表1 美国在“印太”地区参与或创设的小多边经济机制(2016~2022)

名称	创建时间	集团成员	主要内容
印太经济框架(IPEF)	2022年5月	美国、韩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东盟7国	贸易、供应链、绿色经济和公平经济
蓝点网络计划(BDN)	2019年11月	美国、日本、澳大利亚	创新基础设施融资方式,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标准
重建更美好世界计划(B3W)	2021年6月	七国集团(G7)	通过透明和社会可持续的方式,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标准
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计划(PGII)	2022年6月	七国集团(G7)	为发展中国家所需的基础设施提供资金
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	2022年6月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芬兰、法国、德国、日本、韩国、瑞典、英国和欧盟委员会	加强关键矿物的生产、加工和回收,确保清洁能源和其他矿产供应链安全
芯片四方联盟(Chips 4)	计划中	美国、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	与盟友重建本土关键矿物产业链,进而减少对中国矿产依赖
D10 俱乐部(D10 Club)	2020年5月	G7、澳大利亚、韩国和印度	打造技术壁垒,将华为排除在外,降低对中国依赖
四边技术网络倡议(QTN)	2021年12月	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	加强网络安全和关键技术合作
人工智能全球合作伙伴(GPAI)	2022年6月	加拿大、法国、美国、日本、韩国等15个国家	制定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标准与规范,进而限制中国人工智能发展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在基础设施领域,一是推出“重建更美好世界”计划(Build Back Better World, B3W)。2021

年6月12日,美国及其盟友在七国集团(G7)首脑会议上宣布启动B3W计划。^[36]该计划表面上宣称通过提供透明的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帮助发展中国家缩小逾40万亿美元的基建资金缺口,但实际上旨在对冲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启动“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计划(Partnership for Global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 PGII)。2022年6月26日,G7国家领导人宣布启动“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计划。该计划承诺在未来五年内筹集6000亿美元的私人 and 公共资金,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37]但其目的在于为G7国家企业开拓全球基建市场,进而重塑以欧美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格局。三是重启被搁置的“蓝点网络”计划(Blue Dot Network, BDN)。BDN是美国与其盟友日本和澳大利亚联合发起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但在提出后的一年半左右时间里几乎被搁置。拜登政府上台后,在美日澳三国政府支持下,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主持的“蓝点网络”认证咨询会议于2021年6月7日在巴黎正式启动。2022年3月21日,OECD在第三次认证咨询会议上正式发布了一份名为《蓝点网络:优质基础设施投资全球认证框架提案》,该提案旨在掌握引领全球基础设施投资标准。

在供应链领域,一是建立“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inerals Security Partnership, MSP)。2022年6月14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芬兰、法国、德国、日本、韩国、瑞典、英国和欧盟委员会在加拿大多伦多宣布建立MSP。^[38]MSP表面上旨在确保关键矿物的生产、加工和回收,保障对清洁能源和其他关键矿产的供应,以提升各国经济发展能力,但其本质上试图推动美国与盟友的矿产加工合作,进而减少对中国矿产产品的依赖。二是试图构建“芯片四方联盟”(Quartet Alliance for Chips, Chips 4)。该联盟预计将包括美国、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主要以贸易和国家经济安全为由,加强获取关键芯片的渠道,进而将中国从全球晶圆供应链中挤出去。该联盟不仅反映了美国对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担忧,也体现了美国通过构建小多边机制,抑制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的企图。

在技术领域,一是加入“D10俱乐部”(5G Club of 10 Democracies, D10 Club)。2020年5月,美国加入由G7、澳大利亚、韩国和印度组建的一个涉及5G设备及其他技术的“D10 Club”。该俱乐部在5G方面,直接将华为排除在外,以降低对中国5G技术依赖。二是参与“人工智能全球合作伙伴组织”(The Global Partnership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PAI)。GPAI于2020年6月成立,目前已有25个成员国。^[39]GPAI是美欧共同发起的较大规模的打压中国战略性技术发展的“攻守同盟”,力图通过构建不利于中国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规则,来限制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三是创建“四边技术网络”倡议(Quad Tech Network, QTN),2021年12月,在QUAD框架内,美日印澳四方成立了QTN,以确保半导体供应链安全。^[40]

(二)以安全防范为目标,参与或创设竞争性的安全机制

在美国“印太战略”背景下,拜登政府认为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多边安全机制已不能够有效应对中国崛起,故积极在军事协调、军事技术转让和军事情报共享层面创设了一系列以美国为中心的“印太”小多边安全机制,以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围堵和遏制(见表2)。^[41]

在军事协调层面,重启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合作机制(QUAD)。为维护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安全利益,2017年11月,美日印澳四国时隔十年重启四边安全对话机制(QUAD 2.0)。在四

边安全对话机制内,美日印、美日澳、日澳印三边军事安全合作,以及美日、美印、美澳、日印、日澳和印澳双边军事安全合作都取得显著效果。^[42]尤其是美印之间的军事安全合作得到大幅提升。2020年10月27日,双方正式签署了《地理空间合作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BECA)。^[43]BECA是美国与印度继2002年签署《一般军事信息安全协议》(GSOMIA)、2016年签署《后勤交流协定备忘录》(LEMOA)、2018年签署《通信兼容与安全协议》(COMCASA)之后,双方达成的第四份基础性军事协议。这标志着美印双方至少在理论上已达到“准盟友”关系。^[44]

在军事技术转让层面,创设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向盟国和伙伴转让武器技术,是美国对外军事安全合作的重要举措。因为军售和技术转让不仅能增强盟国和伙伴的军事实力,而且有助于修复和巩固双方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2021年9月15日,美英澳三国领导人宣布建立新的“印太”安全联盟AUKUS。AUKUS试图通过实现安全与国防领域相关科学技术、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深度融合,强化三方军事安全合作。^[45]值得注意的是,美英公然向澳大利亚提供进攻性核潜艇技术,很可能导致地区国家群起效尤,进而严重损害国际核裁军和核不扩散的努力,造成严重的核扩散风险。

在军事情报共享层面,企图推动五眼情报联盟扩员(FVIFY)。FVIFY是一个由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英国和美国组成的情报合作联盟。该联盟源于二战期间的英美情报合作。冷战期间,FVIFY主要作用于搜集、分享苏联以及其他华约成员国的通信情报。“印太战略”背景下,FVIFY日益成为美国对华竞争的战略工具,其成员国在“香港”“新疆”等涉华议题上基本采取一致立场并协调行动。目前FVIFY正积极收集和编造证据,计划炮制“中国渗透论”“中国威胁论”等谎言,以抹黑中国国际形象。从长期来看,美国很可能将该情报联盟扩展为“九眼”联盟,即将印度、德国、日本和韩国纳入其中。

表2 美国在“印太”地区参与或创设的小多边安全机制(2016~2022)

名称	创建时间	集团成员	主要内容
四边安全对话机制(QUAD)	2017年11月	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印度	从军事安全合作逐步扩展到新冠疫苗、网络安全、供应链等领域
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	2021年9月	美国、澳大利亚以及英国	军事技术合作
五眼联盟(FVEY)	1941年2月	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	情报共享合作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以民主价值观为纽带,构建对抗性的民主国家联盟

意识形态和民主输出一直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与经济和安全合作相比,民主输出这一路径更具隐蔽性。以“民主”“自由”等价值观输出为抓手,不仅有利于美国“印太战略”整合“印太”地区盟友和伙伴,而且能使美国对外战略更具道德感召力。美国建立“民主国家联盟”的战略构想早已有之。2006年9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曾公布一份名为《铸造法治之下的自由世界——21世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研究报告》,

系统阐述了建立“民主国家联盟”的战略构想,并试图以之替代联合国。^[46]2009年,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发表了题为《中国登场:一种全球关系的战略框架》,同样认为美国应以“推进民主战略”作为加强亚洲民主伙伴关系的战略指南。^[47]

拜登政府上台后,意识形态和民主价值观成了美国对外政策的优先选项。在拜登政府2021年3月公布的《过渡时期国家安全战略指南》(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中,^[48]大量篇幅谈及美国民主在国际社会所遭遇的挑战,“民主”一词先后被提及23次,并计划召集民主国家峰会。最终在2021年12月9日,拜登政府以视频方式举行了具有浓厚意识形态对抗色彩的“全球民主峰会”。^[49]该峰会以美国的好恶划分阵营,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排除在民主标准之外,人为制造了一个完全不必要的、对抗性的“文明冲突”。对中国而言,该峰会一个隐晦而重要的目标是降低中国的全球道德地位,团结盟友和伙伴,进而实现对中国全方位围堵。需要注意的是,拜登政府意识形态外交已经从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直接对抗,转向了中美竞争时代的保持“价值优势”,以便获取更多吸引力,进而打造民主国家联盟。

四、小多边主义视角下拜登政府“印太战略”集团化的动因

战略的集团化运作通常具有较强的协同效应、速度效应和规模效应。^[50]从小多边主义的视角来看,拜登政府积极推动“印太战略”的集团化既有加强美国与盟友和伙伴的政策协同,扩大其在“印太”地区“朋友圈”的战略考量,也有提升美国与盟友和伙伴的合作效率,掌握关键领域标准和规则的制度诉求,更有维护美国与盟友和伙伴的小集团利益,共同围堵和遏制中国崛起的权力诉求(见图2)。

(一) 战略考量:加强美国与盟友和伙伴的政策协同,扩大其在“印太”地区的朋友圈

随着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朋友圈”日益扩大,影响力显著上升。鉴于此,美国企图通过“印太战略”集团化来拉拢更多的盟友或伙伴,进而发挥自己的“集团”优势。而小多边机制的行为可操作性为拜登政府拉拢更多盟友和伙伴提供了便利。因为小多边机制不同于多边机制,其对成员国的准入条件不设置过多门槛,对成员国的对外行为也没有太多约束力,有助于美国拉拢那些在价值观、意识形态上与美国不一致的关键地缘支点国家,加强与这些国家的政策协同,进而扩大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朋友圈”。

以拜登政府深化QUAD合作为例。2017年11月,美日印澳四国时隔十年重启四边安全对话机制(QUAD 2.0)。自重启以来,QUAD对话机制的合作内容,从原本聚焦于维护地区安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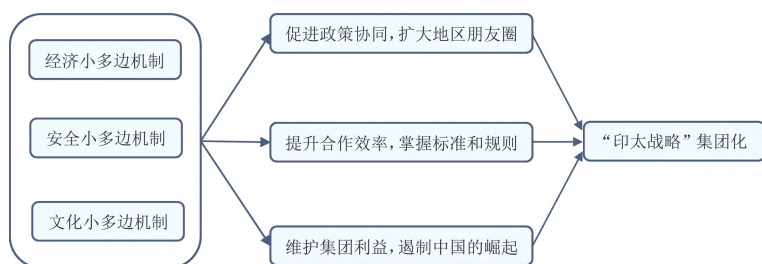


图2 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集团化的驱动因素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利益等议程,扩展到加强疫苗生产分配合作、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再到在关键新兴技术领域建立规范和标准等方面。与此同时,拜登政府也大力鼓动QUAD进行扩员。在“印太”地区国家中,韩国、越南和新西兰最有可能加入该机制。2021年

3月20日,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美日印澳四国与韩国、越南和新西兰通过电话会议方式就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举行了首次“四边+X”会议模式,这种模式很可能会演变为未来“四边+X”会议的借鉴先例。可以预见的是,拜登政府将通过QUAD深化与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传统盟友关系,同时积极拉拢印度、越南、新西兰以及太平洋岛国等国家,加强与这些国家政策协同,进而扩大其在“印太”地区的朋友圈。^[51]

(二)制度诉求:提升美国与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合作效率,掌握关键领域标准和规则

在前三次工业革命中,美西方国家成为标准的制定者和主导者,其他国家不得不按照美西方标准来生产。但近年来随着中国在关键领域的影响力上升,美西方国家开始担忧中国将动摇美西方国家在关键领域标准制定方面的主导地位,从而损害美西方国家霸权利益。基于此,拜登政府试图通过“印太战略”集团化来掌握关键领域标准和规则,而小多边机制议程设置的有效性正好有助于该目的的实现。因为小多边机制不同于多边机制,其集团成员数量少,成员间的利益交集也相对较少,更容易针对性地在关键领域达成共识,更能够提升美国与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合作效率,进而掌握引领关键领域标准和规则。

以拜登政府参与GPAI为例。GPAI旨在通过发布相关政策指南,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应用予以规范。GPAI成立之初,特朗普政府曾以“过度监管会阻碍美国人工智能创新和相关公司的发展利益”予以拒绝。^[52]但随着G7除美国外所有成员国相继加入,拜登政府意识到为掌握全球人工智能的标准和规则,需要受到相关政策和法规的约束,转而在于2020年5月加入GPAI,并成为全球人工智能规则的制定者。美国白宫首席技术官迈克尔·克拉齐奥斯(Michael Kratsios)在美国加入GPAI的新闻发布会上,直接将中国描述为“敌人”,明确其加入GPAI的目的是对抗中国“数字权威”。^[53]从迈克尔·克拉齐奥斯的言论中可以看出,拜登政府旨在以GPAI组织为抓手,提升美国与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合作效率,掌握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规则,从而对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予以限制。

(三)权力诉求:维护美国与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小集团利益,共同围堵遏制中国崛起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国际体系中唯一的超级大国。进入21世纪,随着伊拉克战争引发反美浪潮、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及新兴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美国霸权地位受到严重冲击。而在“印太”地区,美国认为中国的持续崛起和经济影响力不断扩大,已经危及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鉴于此,美国企图通过“印太战略”集团化加强与“印太”地区的经济联系,打造一个排除中国的“印太”经贸体系,维护其在“印太”地区的经济利益。^[54]而小多边机制鲜明的目标针对性恰好有利于拜登政府打造一个排除中国的“印太”经贸体系。因为小多边机制不同于多边机制,其主要以集团利益为合作纽带,是一种排他性的“多边主义”,其能够维护美国与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小集团利益,进而实现“印太”地区经贸体系的“去中国化”。

以拜登政府创设IPEF为例。2022年5月23日,美国总统拜登在访问日本期间,宣布启动IPEF。IPEF的成员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斐济、文莱、印度、印尼、日本、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韩国、泰国和越南。IPEF主要包含贸易、供应链、绿色经济和公平经济四大支柱,而这四大支柱都有明显针对中国的意图。^[55]第一大支柱贸易是为了扩大巩固经济朋友圈,组织由其主导的“印太”经济新网络。第二大支柱供应链则试图建立排除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

国际发展合作新格局。第三大支柱绿色经济的目的是寻求在气候合作、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建立标准和制定规则,进而限制中国发展。第四大支柱公平经济旨在“污名化”中国,污蔑中国利用“非法手段”,获得不公平经济优势。概言之,IPEF是美国刻意打造的排除中国的“印太”小多边经济框架,其目的在于维护美国与盟友和伙伴在“印太”地区经贸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进而围堵和遏制中国崛起。

五、拜登政府“印太战略”集团化的限制因素

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在经济、安全与意识形态领域多管齐下,积极推动“印太”小多边机制落地,意图整合“印太”盟友和伙伴,编织以美国为中心的对华遏制“集团”网络。但与此同时,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集团化也面临着美国与“印太”盟友和伙伴政策诉求差异、战略平衡困境和成本支付能力不足等限制因素。

(一)观念之阻:美国与“印太”盟友和伙伴政策诉求差异

在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集团化进程中,欧盟国家是主要成员国。但欧盟国家的“印太”政策诉求与美国存在一定差异。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主要目标是围堵和遏制中国崛起。相比美国,欧盟“印太”政策更强调包容性。欧盟认为在气候变化、渔业管理、生物多样性和反恐等全球问题上,中欧存在一定合作空间。^[56]另外,欧盟国家持续看好中国市场,希望继续深化对华投资合作。2022年11月5日,德国总理朔尔茨就表示,欧盟不寻求与中国脱钩,中国依然是德国和欧洲重要的经济和贸易伙伴。^[57]除欧盟外,作为美国“印太战略”重要战略支点的印度,也没有完全成为美国的追随者。此次俄乌冲突中,印度对俄态度与四方机制其他国家的立场大相径庭。2022年3月的QUAD峰会因印度的犹疑态度,未能达成谴责俄罗斯的共识。^[58]对俄乌冲突的态度表明,即便印度是QUAD的参与国,其在做重大政策选择时也不会牺牲自身的经济安全利益,完全追随美国的步伐。

(二)结构之困:俄乌冲突可能迫使美国陷入两线作战困境

俄乌冲突爆发后,在美国的怂恿和拉拢下,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发起了全面制裁,并不断加大乌克兰的资金和军事援助,这使得美国与俄罗斯的战略对抗持续升温,两国的外交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此同时,美国也积极在“印太”地区打造小多边倡议或机制,整合盟友和伙伴,进而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全方位遏制中国。有学者就认为,在美国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不断恶化之际,美国将陷入战略平衡困境,尤其是俄乌冲突将极大牵制拜登政府已捉襟见肘的经济与外交资源,影响其在“印太”地区的资源投入。另外,美国同时对抗中国和俄罗斯,将迫使中国和俄罗斯加强战略合作,这将动摇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如果中俄同时采取行动,美国将陷入在亚欧大陆两线作战的战略困境。^[59]

(三)成本之困:成本支付能力不足阻碍“印太战略”集团化

成本支付能力不足是影响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集团化的重要变量。任何战略的实施都需要资源投入和成本支付,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集团化建设同样需要美国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以拉拢盟友与伙伴。^[60]然而,当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已经突破30万亿美元,国内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新冠肺炎疫情救济及教育医疗保健等社会福利改革亟需资金,拜登政府

很难支付实际推进 IPEF 等“印太”小多边机制建设的成本。^[61]换言之,成本支付能力不足,制约了拜登政府“印太战略”集团化建设的经济基础。即使拜登政府希望将其盟友与伙伴作为融资的合作对象来增强美国“印太战略”集团化的经济支撑,也会制约美国“印太战略”的议程设置能力和战略自主性。

六、拜登政府“印太战略”集团化对中国的影响

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集团化以重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领导力为主要目标,崛起的中国成为首当其冲的战略竞争对手和防范对象。虽然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集团化也存在一些限制因素,但更需警惕的是其对中国的冲击和影响。

(一)经济维度:弱化中国经济影响力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在地区和全球的经济影响力不断上升。最为显著的是,自 2009 年起,中国连续 12 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2020 年,东盟历史性地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而 2022 年 2 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全面生效,将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构建更加紧密的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稳步推进亚太区域经济融合发展。但随着拜登政府积极打造经济小多边机制,美国“印太战略”在经济层面集团化持续深化,特别是由美国主导的 IPEF 如果按计划成型,将与 RCEP 形成互相涵盖、互相竞争的对抗之势。

与此相伴随的是,中国与亚太地区国家经济合作的风险性将上升,地区分工合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将遭受颠覆性不利影响。因为在美国“印太战略”背景下,部分亚太国家一直希望抓住机遇,承接美国强行调整出中国的产业链,促进自身经济发展,最终这些国家在产业分工、吸引投资、服务贸易等领域与美国经济的捆绑将会加深。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亚太国家更深程度参与 RECP 等地区经贸合作的意愿和动力,进而弱化中国的经济影响力。

(二)安全维度:增加中国安全风险

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显著强化盟国和伙伴在其“印太战略”中的支柱地位,与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加坡的军事安全合作不断提升;作为“印太”地区同盟关系重要补充的关键支点,其大力发展与印度、越南、马来西亚以及印度尼西亚的军事安全合作;美国也积极推动英国、法国以及德国等欧洲盟友重返“印太”。2021 年英法德三国分别出动军舰巡航“印太”,并与美日印澳举行了双多边联合军事演习。随着拜登政府积极打造以双边同盟体系为基础的小多边机制,美国“印太战略”在地区安全层面的集团化布局更趋完善,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中国安全风险。

譬如,在南海问题上,美国不仅挑拨南海声索国以法律手段与中国就南海问题展开博弈,而且在持续强化自身南海军事存在的同时,不断强化针对中国的军事行动的频次和烈度,同时鼓动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印度以及澳大利亚等域外盟友和伙伴与南海声索国展开联合军事演习。由此可见,美国与盟国和伙伴正在以“集团优势”介入南海问题,这很可能导致南海声索国与中国围绕南海问题进行博弈的强度和频度均有所增加,进而无形中会推高南海局势的紧张化,增加中国的安全风险。^[62]

(三) 观念维度: 损害中国国家形象

国家形象是一国对外交往和软实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63]国家形象的形成是国家特征的“自我”设定与“他者”的社会承认两方面结合的。近年来,随着中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等理念进行国际化叙事,中国发展故事和国家形象在全球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肯定和认可。^[64]《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 2019》数据显示,63%的海外受访者认为中国国家形象在过去70年得到提升,其中发展中国家受访者持此观点的比例高达80%。^[65]但随着拜登政府积极创设价值观小多边机制,美国“印太战略”在意识形态层面的集团化将严重损害中国国家形象。例如,在美国举行的“全球民主峰会”上,其多次用“威权国家”“专制国家”的称谓形容中国,企图抹黑中国,给中国国家形象带来严重的危害。

七、结论

相较于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拜登政府“印太战略”具有鲜明的自身特点,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拜登政府更加重视小多边外交。就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推进态势而言,其已在基础设施、供应链和科学技术领域参与或打造排他性的小多边倡议,在军事协调、军事技术转让和军事情报共享层面参与或创设竞争性的小多边机制,在价值观层面构建对抗性的全球民主国家联盟。机制化是集团化的手段,集团化是机制化的目的。拜登政府积极推动“印太战略”的集团化既有加强美国与盟友和伙伴的政策协同,扩大其在“印太”地区“朋友圈”的战略考量,也有提升美国与盟友和伙伴的合作效率,掌握关键领域标准和规则的制度诉求,更有维护美国与盟友和伙伴的小集团利益,共同围堵和遏制中国崛起的权力诉求。虽然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集团化面临着美国与“印太”盟友和伙伴政策诉求差异、战略平衡困境和成本支付能力不足等因素掣肘,但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集团化在一定程度上将弱化中国经济影响力,增加中国安全风险,损害中国国家形象。

参考文献

- [1]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Preparedness, Partnerships, and Promoting A Networked Region [EB/OL]. <https://media.defense.gov/2019/Jul/01/2002152311/-1/-1/1/DEPARTMENT-OF-DEFENSE-INDO-PACIFIC-STRATEGY-REPORT-2019.PDF>, 2019-06-01.
- [2] The White House.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EB/OL].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2/02/11/fact-sheet-indo-pacific-strategy-of-the-united-states/>, 2022-02-11.
- [3] 赵菩,李巍.霸权护持:美国“印太”战略的升级[J].东北亚论坛,2022(2):24-46.
- [4] Muhammad Saeed. From the Asia-Pacific to the Indo-Pacific: Expanding Sino-U.S. Strategic Competition[J]. China Quarterly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Vol.3, No.4, 2017, pp499-512.
- [5] David Scott. The Indo-Pacific in US strategy: Responding to power shifts[J]. Rising powers quarterly, Vol.2, No.2, 2018, pp19-43.
- [6] 刘雪莲,郭鸿炜.“印太”概念下东亚地缘政治结构的转变及中国的战略选择[J].东北亚论坛,2021(2):54-68.
- [7] 葛腾飞.“印太”地区安全秩序纷争与中国的地区秩序愿景[J].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21(3):

- 73-100.
- [8] 曾向红,张少文.从“亚太”到“印太”:批判地缘政治学视角下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J].当代亚太,2021(3):4-38.
- [9] 陈宇.经典地缘政治理论视域下的“印太”及其内在张力[J].东北亚论坛,2022(2):66-80.
- [10] Li Mingjia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geo-economics and Indo-Pacific security competition [J].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6, No.1, 2020, pp169-187.
- [11] William Choong. The Quad and the Indo-Pacific: Going Slow to Go Further [EB/OL]. https://www.think-asia.org/bitstream/handle/11540/14319/ISEAS_Perspective_2021_125.pdf?sequence=1, 2022-09-13.
- [12] 唐新华.西方“技术联盟”:构建新科技霸权的战略路径[J].现代国际关系,2021(1):38-46;孙海泳.论美国对华“科技战”中的联盟策略:以美欧对华科技施压为例[J].国际观察,2020(5):134-156.
- [13] 毛维准.美国的印太基建攻势:演变、逻辑与局限[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85-97.
- [14] 陈靓.美国贸易政策新思维映射下的“印太经济框架”[J].国际展望,2022(6):91-107.
- [15] Raihan Ronodipuro. Biden Diplomacy: A Value-Based Alliance [EB/OL]. <https://modern diplomacy.eu/2021/07/01/biden-diplomacy-a-value-based-alliance/>, 2021-07-01;邢瑞利.拜登政府“民主国家联盟”构想评析[J].当代美国评论,2021(3):37-57.
- [16] 叶成城,王浩.拜登政府价值联盟战略初探[J].现代国际关系,2021(9):11-17.
- [17] 王鹏权.美国印太战略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特征分析[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1(3):131-144.
- [18] 赵明昊.盟伴体系、复合阵营与美国“印太战略”[J].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6):26-55;刘国柱.复合型模块化联盟:拜登政府应对大国竞争的联盟战略[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34-49.
- [19] Miles Kahler. Multilateralism with small and large numbers[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6, No.3, 1992, p707.
- [20] Victor D. Cha. The dilemma of regional security in East Asia: Multilateralism versus bilateralism [J]. Regional conflict management, 2003, pp104-122.
- [21] Moises Naim. Minilateralism [J]. Foreign policy, Vol.173, 2009, p136.
- [22] 张勇.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地区“少边主义”外交浅析[J].美国研究,2012(2):66-81.
- [23] William Tow. Minilateral security's relevance to US strategy in the Indo-Pacific: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J]. The Pacific Review, Vol.32. No. 2, 2019, p32.
- [24] 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38.
- [25] 陈柏岑.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小多边问题研究[J].边界与海洋研究,2021(5):20-43.
- [26] 李晓燕.多边主义:历史与理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2:23.
- [27] Patrick Stewart. The new "new multilateralism" Minilateral cooperation, but at what cost? [J]. Global Summitry, Vol.1, No.2, 2015, pp115-134.
- [28] 郑宇.21世纪多边主义的危机与转型[J].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8):126-153.
- [29] 沈伟,胡耀辉.美式小多边主义与美国重塑全球经贸体系[J].国际论坛,2022(1):3-24.
- [30] Robyn Eckersley. Moving forward in the climate negotiations: Multilateralism or minilateralism? [J].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12, No.2, 2012, p32; Robert Falkner. A minilateral solution for global climate change? on bargaining efficiency, club benefits, and international legitimacy [J].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14, No.1, 2016, p89.
- [31] 戴维来.中等强国集团化的理论研究—发展趋势与中国应对[J].太平洋学报,2015(2):30-41. Rajeswari Pillai Rajagopalan. Russia-India-China Trilateral Grouping: More Than Hype? [EB/OL]. <https://policycom->

- mons.net/artifacts/1346807/russia-india-china-trilateral-grouping/1958955/, 2022-07-13.
- [32]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of Australian Government. Joint Statement on the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Initiative by Australian, Indian and Japanese Trade Ministers [EB/OL]. <https://www.dfat.gov.au/news/media-release/joint-statement-supply-chain-resilience-initiative-australian-indian-and-japanese-trade-ministers-0>, 2022-07-15.
- [33] 曼瑟尔·奥尔森. 集体行动的逻辑[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33.
- [34] Troy Lee-Brown. Asia's security triangles: Maritime minilateralism in the Indo-Pacific [J]. East Asia, Vol.35, No.2, 2018, p168.
- [35] 许嫣然, 曹司彬. 多边主义理论辨析与全球治理实践危机[J]. 教学与研究, 2022(5): 112-121.
- [36] 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 Biden and G7 Leaders Launch Build Back Better World (B3W) Partnership [EB/OL].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6/12/fact-sheet-president-biden-and-g7-leaders-launch-build-back-better-world-b3w-partnership/>, 2021-06-12.
- [37] 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 Biden and G7 Leaders Formally Launch the Partnership for Global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 [EB/OL].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6/26/fact-sheet-president-biden-and-g7-leaders-formally-launch-the-partnership-for-global-infrastructure-and-investment/>, 2022-06-26.
- [38] U.S. Department of State. Minerals Security Partnership [EB/OL]. <https://www.state.gov/minerals-security-partnership/>, 2022-07-25.
- [39] The Global Partnership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hat is the membership process to join GPAI? [EB/OL]. <https://gpai.ai/>, 2022-07-30.
- [40] Australian Government. The Quad Tech Network [EB/OL]. <https://www.internationalcybertech.gov.au/node/13>, 2022-08-01.
- [41] Joel Wuthnow. US "Minilateralism" in Asia and China's Responses: A New Security Dilemma? [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28, No.115, 2019, pp133-150.
- [42] 凌胜利, 王彦飞. 霸权的逻辑: 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多边转向[J]. 国际安全研究, 2022(4): 91-126.
- [43] Shubhajit Roy. BECA, and the importance of 3 foundational pacts of India-US defence cooperation [EB/OL].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explained/becca-india-us-trade-agreements-rajnath-singh-mike-pompeo-6906637/>, 2022-08-03.
- [44] 罗圣荣, 赵祺. 美国“印太战略”对中国—东盟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挑战与应对[J]. 和平与发展, 2021(3): 115-134.
- [45] The White House. Joint Leaders Statement on AUKUS [EB/OL].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9/15/joint-leaders-statement-on-aukus/>, 2022-09-15.
- [46] 阮宗泽. 权力盛宴的黄昏—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与中国对策[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15: 85.
- [47] Abraham Denmark, Nirav Patel. China's Arrival: A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a Global Relationship [EB/OL]. <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reports/chinas-arrival-a-strategic-framework-for-a-global-relationship>, 2022-08-03.
- [48] The White House.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EB/OL].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3/03/interim-national-security-strategic-guidance/>, 2021-03-03.
- [49]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emocracy doesn't happen by accident. We have to defend it, fight for it, strengthen

- it, renew it [EB/OL]. <https://www.state.gov/summit-for-democracy/>, 2022-08-08.
- [50] 于琦. 集约化: 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的新境界[J]. 会计之友, 2011(15): 56-58.
- [51] Kelley Currie, Joshua Fitt, Alexander Sullivan. NOTEWORTHY: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EB/OL]. <https://www.cnas.org/press/press-note/noteworthy-indo-pacific-strategy-of-the-united-states>, 2022-06-15.
- [52] Éanna Kelly. US joins global AI group, citing technology threat from China [EB/OL]. <https://sciencebusiness.net/international-news/us-joins-global-ai-group-citing-technology-threat-china>, 2022-08-10.
- [53] Dave Nyczepir. The US joined a global AI partnership for coronavirus recovery to stick it to China [EB/OL]. <https://www.fedscoop.com/us-global-ai-partnership-china/>, 2022-08-12.
- [54] The White House.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EB/OL].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2/02/11/fact-sheet-indo-pacific-strategy-of-the-united-states/>, 2022-02-11.
- [55] The White House. In Asia, President Biden and a Dozen Indo-Pacific Partners Launch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 [EB/OL].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5/23/fact-sheet-in-asia-president-biden-and-a-dozen-indo-pacific-partners-launch-the-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for-prosperity/>, 2022-05-23.
- [56] European Commission. Questions and Answers: EU Strategy for Coope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 [EB/OL].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qanda_21_4709, 2022-08-15.
- [57] Shannon Tiezzi. China Celebrates German Chancellor's Trip [EB/OL]. <https://thediplomat.com/2022/11/china-celebrates-german-chancellors-trip/>, 2022-10-08.
- [58] Rajeswari Pillai Rajagopalan. Quad Summit Indicates Growing Strength [EB/OL]. <https://thediplomat.com/2022/05/quad-summit-indicates-growing-strength/>, 2022-08-20.
- [59] Di Pane James, Miller Octavian. U.S. Military Forces Cannot Fight on 2 Fronts [EB/OL]. <https://www.heritage.org/defense/commentary/us-military-forces-cannot-fight-2-fronts>, 2022-08-22.
- [60] 叶海林. 美国“印太战略”的逻辑缺陷与中国的应对[J]. 印度洋经济体研究, 2022(5): 1-14.
- [61] 韦宗友. 拜登政府“印太战略”及对中国的影响[J]. 国际问题研究, 2022(3): 29-46.
- [62] 金永明, 崔婷. 美国南海政策的演变特征与成效评估(2009—2022)[J]. 南洋问题研究, 2022(2): 101-114.
- [63] 马得勇, 陆屹洲. 国家形象形成的心理分析[J]. 国际政治科学, 2022(1): 114-148.
- [64] 高徽, 曾勇. 西方媒体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双面建构——以《经济学人》2019年涉华报道为例[J]. 国际传播, 2020(3): 56-68.
- [65] 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 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 2019[R]. <http://www.accws.org.cn/achievement/202009/P020200915609025580537.pdf>, 2022-08-28.

[责任编辑 路京京]

The Indo-Pacific Strategic Grouping of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 A Perspective of Mini-lateralism Theory

ZHAO Qi LUO Sheng-rong • 65 •

Abstract : After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came to power , it vigorously promot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do-Pacific strategic mini-lateralism and strengthened the containment of China.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mini-lateralism theory ,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Indo-Pacific strategy actively creates exclusive multilateral initiatives in the fields of infrastructure , supply chain and technology , creates competitive multilateral initiatives in military coordination , military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military intelligence sharing , builds a functional global alliance of democracies at the level of values , intends to integrate Indo-Pacific allies and partners , and weave a US-centered "bloc" network of containment against China. Mechanism is the appearance of collectivization , and collectivization is the core of mechanization.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Indo-Pacific strategic grouping not only has the strategic consideration of expanding the "circle of friends"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 but also has the institutional demands to master and lead the standards and rules in key areas , and also has the power demands to contain China's rise. In the future ,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Indo-Pacific strategic grouping will face the constraints of differences in policy appeal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allies and partners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 strategic balance difficulties , and insufficient ability to cover costs. To a certain extent , it will weaken China's economic influence , increase China's security risks , and damage China's national image in the future. In view of this , China should acceler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s , vigorously promote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s , and promote the building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Key Words : Biden Administration ; Indo-Pacific Strategy ; Group Politics ; Mini-lateralism ; Sino-US Relations

The Evolution of China-Japan-ROK Clean Energy Cooperation in the Context of Carbon Neutrality

LI Xin-lei LIU Xiao-na • 80 •

Abstract : China , Japan , and Republic of Korea , the three major powers in Northeast Asia , have respectively promised carbon neutrality by mid-21 century and formulated a variety of national strateg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lean energy and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green economy , which provides important opportunities for clean energy cooperation among the three countri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gional energy governance. China , Japan , and Republic of Korea have cooperated in the field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green energy for more than 30 years , and the evolution of clean energy cooperation among the three countries presents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level and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and "new multilateral co-governance". However , clean energy coope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complex , which is reflected in the lack of political mutual trust and lag of regional energy mechanism construction , dependence on high-carbon path and regional competition on green industry , extra-territorial interventions from major powers and new geopolitical risks caused by energy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reen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 China should exert its structural advantages as the world's major producer of clean energy , take the trend of carbon neutrality as an opportunity and promote inclusive , pragmatic , and sustainable regional clean energy cooperation from mechanism innovation , competition management , regional cohesion , and tension mitigation , so as to play an active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order of regional energy governance in Northeast Asia.

Key Words : Carbon Neutrality ; Clean Energy Cooperation ; China-Japan-ROK ; Northeast Asia ; Energy Transformation ; RCEP

The Evolution of Biden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 Russia : Features , Motivations , and Limits

SUN Cheng-hao ZHENG Le-feng • 98 •

Abstract : Since Joe Biden was elected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 new shifts in U.S. policy toward Russia have shown a distinct dual-track aspect. On the one hand ,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continues to pursue tough measures toward Russia based on its values. On the other hand , the two sides actively engaged in strategic stability dialogues , and the U.S. once attempted to establish a bilateral relationship that was "stable and predictable". But Russia-Ukraine conflict forced Biden administration to adjust its Russia policy and to achieve the strategic goal of containing Russia through comprehensive sanctions and political isolation to weaken Russia together with its allies and partners. The evolution of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 Russia is driven by the return of the traditional establishment and its variations in governing philosophy , the continuance and modification of strategic concepts , and third-party factors such as China and Europe. The prolonged confrontation between Russia and Ukraine has prompted a strategic community reconsideration of U.S. policy toward Russia , and the domestic public is less willing to shoulder the expense of being tough on Russia , providing some possibility for a shift in U.S. policy toward Russia. However , given geopolitical and strategic perception conflicts , structural difficulties , and significant U.S. internal politics limitations , improving their relationship in the medium term would be challenging. Meanwhile ,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has sparked a new cycle of intensive interactions among the U.S. , Russia , and Europe , altering the structure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 significantly. China should take advantage of the shifting circumstances to create a favorable external strategic environment for its own development.

Key Words : Biden Administration ; Ukraine Crisis ; U.S. Policy toward Russia ; U.S.-Russia Relations ; China-U.S.-Russia Relations

The Changes of Republic of Korea's Attitude toward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 Considerations and Impacts

ZHU Xu HAN Wen-chao • 115 •

Abstract : After the United States proposed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 Republic of Korea's attitude toward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went through two stages : "cautious and limited participation" under the Moon Jae-in administration and "active and adaptive participation" under the Yoon Seok-Youl administration. The Yoon Seok-Youl government's attitude change mainly includes four considerations : to carry out security deterrence against the DPRK , to promote the denuclearization process of the peninsula , to join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as a lever to reshape China-ROK relations to ease the security dilemma , to promote the "Korean-style democratic values diplomacy" to enhance Korea's status in the regional order , and to promote the "ASEAN policy" to seek new economic growth points. In the short term , this shift will intensify the inter-Korean conflict and increase regional tension , enhance the economic attractiveness of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and crowd ou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 strengthen the "decentralized" feature of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and increase the pressure on China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order. However , in the long run , the Yoon Seok-Youl administration has not deviated from the principle of "formulating diplomatic strategy based on national interests" and still possesses "bottom line rationality". Moreover ,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cannot effectively meet the economic , security , and strategic demands of Korea , which lacks the motivation to continuously participate in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 and its negative impact is generally controllable.

Key Words : Indo-Pacific Strategy ; Denucleariz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 Active Adaptive Participation ; "ASEAN Policy"